

中国音乐史学 现代转型研究

ZHONGGUO YINYUE SHIXUE
XIANDAI ZHUANXING YANJIU

黄敏学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研究”(项目文号：
13YJC760033)宁波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清代音乐史考编”结项成果

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研究

黄敏学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研究/黄敏学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650 - 3686 - 6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音乐史—研究—中国 IV. ①J6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2890 号

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研究

黄敏学 著

责任编辑 王钱超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话	人文编辑部:0551-6290320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张	13.7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235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安徽昶颉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3686 - 6

定价:4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00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005)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009)

上编 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因

第一章 雅俗分流格局下清代音乐史学中的复古主义倾向	(015)
第一节 中国音乐史学雅俗分流格局的形成与影响	(016)
第二节 清代音乐史学领域内的复古主义思潮	(022)
第二章 清代音乐史学领域内早期反复古主义思潮	(032)
第一节 毛奇龄、李塨的音乐史学思想	(034)
第二节 江永对音乐史学的贡献	(044)
第三章 程瑶田的乐器考古及其音乐史学思想	(053)
第一节 程瑶田的乐器考古	(054)
第二节 程瑶田的音乐史学思想	(062)
第四章 凌廷堪与中国音乐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066)
第一节 《燕乐考原》的文献学研究	(067)
第二节 凌廷堪对燕乐理论问题的探研及其得失	(076)
第三节 凌廷堪对词乐史的总体性认识	(083)
第四节 “以礼代理”、实事求是的音乐史学思想	(087)

第五章 中国传统音乐史学之余晖	(091)
第一节 徐养原的“因俗变雅”论	(091)
第二节 陈澧与中国传统音乐史学的终结	(096)

下编 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的外在影响

第六章 明清之际的西乐东渐及其反响	(115)
第一节 明季利玛窦进献古钢琴与改编《西琴曲意》	(115)
第二节 清前期西乐东渐与康熙帝对西洋音乐的接受	(119)
第七章 《律吕正义》对中国传统乐学之改造	(124)
第一节 康熙“十四律”理论及其影响	(124)
第二节 《律吕正义》的编纂过程及其内容结构	(130)
第三节 《律吕正义》对传统音乐史学的理论总结	(133)
第四节 《律吕正义》与西乐理论的系统输入	(136)
第五节 《律吕正义》续编对《律吕纂要》的继承与发展	(139)
第六节 《律吕正义》中的“西学中源”论	(144)
第八章 中国音乐史学在清末民初的嬗变与转型	(155)
第一节 西洋乐理在中国的传播与融合	(155)
第二节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音乐史学与音乐思想的变革	(160)
第九章 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	(179)
第一节 阿里嗣及其《中国音乐》	(179)
第二节 花之安、卫礼贤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	(185)
第三节 萧友梅、王光祈与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	(189)
结语	(200)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4)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音乐史学作为音乐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有其悠久的学科历史、独到的学术内涵和广阔的学科前景，“音乐史学是解释从过去到现代音乐现象发展的学问。19世纪后半期提倡音乐学时，面临的课题就是追求音乐史学的严密性，音乐史学比当时称为音乐学中的任何分科都重要”^①，中国亦然。因此，首先，我们有必要对“音乐史学”的学科范围予以界定，对其发展变化过程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当然，目前学界对“音乐史学”这个术语尚存不同理解，从所涉及的范围上看，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狭义的”“小范围”的定义，即把音乐史学仅仅限定于对音乐作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阿德勒提出的^②。

一种是“广义的”“大范围”的定义，即把音乐史学的学术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领域。随着人们对音乐艺术本身特殊性探讨的不断深入，音乐作为音响艺术的非语义性和作为社会意识的复杂性也为人们所认识，“音乐”与“非音乐”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只能通过历史诠释学研究“作为历史的音乐”，而不能单纯研究“音乐的历史”，田可文先生

^① [日]竹内敏雄主编，刘晓路等译：《美学百科辞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② 阿德勒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提出，音乐史学的课题是研究和叙述“作曲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它的对象是音乐作品，包括它们的形成过程，并根据作品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分类，研究某些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立性，以及音乐家相互影响关系的问题”。在这一定义中，作品及其风格的发展被置于音乐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参见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见解^①。由此，德国著名音乐学家达尔豪斯指出：

音乐史家如果要公正对待自己的客体对象，就决不能忽视他希望在历史语境中解释的某些作品所具有的当下审美现时性。如果像叙述政治的过去那样讲述音乐的过去，那是极不现实和极端荒谬的。古老的音乐作品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现在——作为音乐而不是作为文献的证据。^②

田可文亦言：“从广义上讲，音乐史的对象是‘历史过程中’人类所从事音乐的一切所作所为，并连同这些行为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从狭义上说，其实质是透过历史过程中一切音乐活动而起主导地位与支配作用的思想。”^③

当然，音乐史学与音乐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早在百余年前便引起梁启超的注意，“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④。在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门类，音乐史学成为音乐学下属二级学科的今天，音乐史学的学术视阈应当最大限度地予以扩大，成为介于历史学和音乐学之间独立的分支学科，田可文先生即指出，音乐史学的学科体系构架应包括三个部分^⑤。

笔者以为，音乐史学应该不仅是对过去时代的静态的、记叙性的探讨，而应是与现实联系的、动态的、实践性的研究，进而揭示音乐发展变化的历史性规律，为分析和把握当代各种音乐现象提供历史依据。音乐史学不仅要研究我们“现今视阈”中的音乐史，更要研究历代音乐史家“初始视阈”中的音乐史，并最终达到“视阈融合”。音乐史学就是研究音乐作为历史被接受

^① 田可文认为，“音乐历史的研究在于对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音乐事件进行历史的考察……在研究具体形态的同时，尤为对‘历史过程’发生强烈兴趣。它的研究完全是按照历史的模式进行微观或宏观的观察，并力图透过历史事件的表面形态去揭示其形成的本质内涵，去探寻音乐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田可文：《音乐史：研究什么？》，《交响》1989年第2期）

^② [德]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③ 田可文：《音乐史：研究什么？》，《交响》1989年第2期。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⑤ 田可文认为，“音乐史学的学科体系构架应包括三个部分：1. 音乐史（包括音乐史研究）；2. 音乐史学方法（或称音乐史学理论）；3. 音乐史学史。在第一部分中，‘音乐史’由客观存在的‘音乐事实’与主观阐释的‘音乐史研究’组成，它是‘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最终体现；第二部分是我们赖以研究前者的重要手段与途径；第三部分则是我们总结经验并更好地展开研究工作的必备条件”。（田可文：《论音乐史学的学科体系构架》，《黄钟》2007年第1期）

的过程。清代音乐史学在中国音乐史学史上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时代特性拥有卓荦不群的历史地位，而由此导致的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则更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对清代传统音乐史学及其现代转型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雅俗分流历史演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与嬗变，而且还是清代史学史、文献学史和学术思想研究的题中之义。正如梁启超所言：“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宜”，“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二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①

基于近代文化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音乐史学作为社会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转型的道路。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必由阶段，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却不是按照自己的历史轨迹“自然”进入的，而是在强大的外力干预下被“强制”进入的。正如桑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中所言：

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学界往往用现代化的解释框架来加以认识。不过，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之类的两极范畴，最终实际上落实到中西对立的概念之上，不仅是简单地找变化，而且所找出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西化”。但是，转型绝非如此简单，至少应该考虑到：①中国固有的知识与制度体系的渊源、变化与状况；②外来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具体形态及其进入中国的过程、样式；③中国人如何接受外来的知识与制度，外来知识及制度如何与中国固有的知识及制度发生联系；④在上述过程中，本土与外来的知识和制度如何产生变异，形成何种新形态；⑤这些变异对中国的发 展所产生的制约性影响有哪些。^②

虽然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确实蕴含现代性因素，而且本书上编还从“范式转换”的视角对清代音乐史学中的现代科学精神予以详尽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晚清开始的近代文化转型，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因此，当时许多人对这种现代转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② 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载桑兵、赵立彬主编：《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型并不适应，而音乐与思想、文化、政治及社会的复杂联系，音乐本身的古、今、中、西、雅、俗之间的多重关系，都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综纷纭之情形。偏于保守者认为，这种转变是“以夷变夏”，犯了祖宗大忌，提倡“乐者古以平心论”；而激进的观点则认为改得不够快，革得不够多，强调“中国音乐改良说”，抛出“全盘西化”的论调。这些观念的对立与困惑，首先表现在音乐文化之中西对立难于化解；其次表现在因此而强化了音乐文化之古今的脱节。中国音乐史学也正在这种种论争和责难之中，逐渐完成其现代转型，这便是本书下编所要详细探讨的论题。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属于音乐史与学术史的研究范畴，理应在“学”与“术”两方面着力。“学”指清代及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基本内容，既有对这一时期的各类音乐文献、音乐技法、音乐风格等音乐本体内容的研讨，也有对音乐史家生平、思想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史学学科建设等内容；“术”是音乐史家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音乐史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原则，也有音乐史家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及其所体现出的时代学术思潮，还包括在西乐东渐和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的过程及其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等。上述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本书的撰写中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统一体。

笔者在戴嘉枋对音乐史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界定^①的基础上，提出“学术思想史视野中的音乐史学”的命题和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音乐史学史学科的学术构想，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对中国音乐史学进行研究和考察，不仅要着眼于音乐作品及音乐制度本身，更要透过音乐文化的发展演进轨迹去揭橥其间的相因之义，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对音乐史学做学术“总体史”考察，此乃笔者对清代音乐史学嬗变与转型研究之着眼点所在。笔者通过对清代音乐史学嬗变与转型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研，试图从整体上揭橥从明清易代之际直至五四运动前夕（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兴起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西乐东渐、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轨迹。本书将

^① 戴嘉枋在《从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谈其存在价值》一文中指出，音乐史学应研究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即音乐文化历时展衍中的连续性，应当是音乐史学最主要的着眼点。音乐史学不仅要回答音乐历史“是什么”，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还应探索其“为什么”，从前因后果中记述阐明某种音乐文化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发展过程。音乐史从本质上是音乐艺术史，那么音乐史学的主线无疑应当是人类在音乐审美创造与审美实践中的历史发展过程。音乐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人类音乐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动因和结果的系统科学阐述，达到音乐文化积累和传播的目的，使人们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对音乐艺术发展途径的自我认识中，增强后人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能力，这也正是音乐史学的价值所在。（载《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2期）

从清代音乐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影响两方面，以上下两编的形式分别予以研探。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中国音乐史学对于清代中叶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目前仍较为薄弱，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代以降的传统目录学著述，较有代表性的有《经义考·乐类》《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录》《贩书偶记》《清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清国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等相关文献。此外，一些考订性目录学论著也对乐学文献有所涉及，如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上述目录学著述对清代乐学文献的版本源流、著者里籍、卷帙多寡等均有著录，其中《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清文献通考·经籍志》《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对所著录文献有较为详尽的述评。音乐目录专书则以《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 年版）为代表，对中国乐学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收录，形成其独特的文献分类体系。

第二，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清代音乐史学云：

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也。清初自诩知乐者首为毛西河，著有《竟山乐录》（一名《古乐复兴录》）、《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等书，而李恕谷从之游，著有《学乐录》以申其说，此四书可称为毛氏一家之学……初期汉学家之乐学著作，最有名者为江慎修之《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一卷（笔者按：当为十卷）。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理，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而介其间者有徐新田（养原），次仲之书曰《燕乐考原》六卷……年辈稍后于次仲者有徐新田（养原），著有《荀勖笛律图注》、《管色考》、《律吕臆说》等书……陈兰甫所著曰《声律通考》十卷，兰甫著书动机，盖因读次仲书而起，而驳正其说亦最多。^①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4 页。

梁氏还从总体上概括出清代音乐史学主要成就：“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二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①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也附带提及乐学：“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次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是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焦循著《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而有用矣。”^②

梁启超屡次对清代学者音乐史学之成绩加以介绍与宣扬，可谓吾国治清代音乐史学之开山者也。许之衡于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中国音乐小史》第九章《清乐述略》概述了清代音乐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一曰确定一字一音也；一曰乐器悉遵经籍也；一曰考定黄钟声律较确也，“要之，康熙制乐，援据经典，精密算术，多经实验，而成美备之制作……历朝议复雅乐，旋兴旋废，稽诸史乘，未有如清行之最久者；其乐器今尚保存，舍此更无从而得见古乐制度”。许之衡认为清代音乐史学乃“言雅乐者一大可研究之资料也”^③，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一度归于沉寂，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概论性研究主要有：郑锦扬的《中国音乐史学史论》等相关系列论文，对中国音乐史学进行了宏观整体性研究，并对清代音乐史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整理；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第三章《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学》，对有清一代的音乐史学成就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清代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方宝璋、郑俊晖的《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则是近年来音乐文献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学界当前音乐史学与音乐文献学研究之最新进展，其中第四章《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中的音乐文献》、第五章《会要会典中的音乐文献》、第六章《〈十通〉中的音乐文献》、第七章《类书中的音乐文献》、第八章《古代音乐著作》、第九章《古代著述中的音乐篇章》等，均对清代音乐史学的内容有所涉及，对《大清会典事例》、“七通”、《古今图书集成》、《律吕正义》等清代音乐史学名著则予以专门介绍与评述。相对重要的文献整理研究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③ 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则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论文两篇，分别为：李一俊的《江永〈律吕阐微〉整理与研究》（2009）和李自浩的《陈澧〈声律通考〉整理与研究》（2007）。

第四，对清代音乐史学进行总体性断代研究目前尚无相关成果面世，但对清代音乐史学的专书研究目前则有一定成绩，主要集中在《清史稿·乐志》《清国史·乐志》等音乐断代史和《律吕正义》《律吕纂要》等音乐史料文献的研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陈万鼎的《〈清史稿·乐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是这一领域的开山性著作；温显贵的《〈清史稿·乐志〉研究》（崇文书局2008年版）虽然是同名著作，但在清代音乐史学体系化研究方面却有重要价值；吴倩的《对〈清史稿·乐志〉三个问题的初识》（《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从《清史稿·乐志》的设置与编次、基本结构和内容及其音乐史学意义三个方面对其予以论述与评价，史料翔实，言皆有据，颇见功力；王冰的《〈律吕纂要〉之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4期）一文则从版本、内容和与《律吕正义·续编》之比较等三个方面揭橥《律吕纂要》这部并未引起世人重视的清代音乐史著的史料价值和史学地位，对《律吕纂要》的文本分析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对音乐史学流变所起的历史作用予以评介，是近年来清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一篇力作。此外，对《律吕正义》及《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的整理与研究，有福建师范大学管亚男的硕士论文《〈律吕正义·续编〉的初步研究》（2010年）、武汉音乐学院田甜的硕士论文《〈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的编纂研究》（2010年）等。

第五，迄今为止，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不仅国内学者，甚至相当多的海外学者，都有涉及这一问题的很有价值的论著，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从社会文化转型、学术思想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了学术依据。而海外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提出的两种著名研究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中国中心”模式，对本书尤其是最后两章研究框架的形成，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本书在探讨清代中国传统音乐史学的嬗变与现代转型时，基本遵循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先生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的研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融入笔者对中国音乐史学阶段性发展特征及其现代转型之研究心得，力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音乐史学现代转型为契机，进一步研究音乐技法在西乐东渐的背景下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以期为当前的音乐创作与批评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对本课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著主要有：耿云志主编“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起

陆续出版），桑兵、赵立彬主编《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吴根友、孙邦金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麻天祥著《中国近代学术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开、刘冠才主编《晚清学术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艾尔曼自选集《经学·科举·文化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张昭军著《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等。

第六，清代中西音乐交流史是清代音乐史学嬗变与转型中不容忽视的论题，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与集大成者首推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篇第八章，相关内容有：①顺治、康熙二朝北京天主堂之乐器；②清圣祖之爱好西乐与西教士之传授；③《律吕正义》编纂经过及德里格之成就；④乾隆宫中之西乐与中国乐书之翻译。专门的研究著作则以陶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与《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清末）》（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王耀华主编《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推广与传播》（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最为著名，然多为史事之叙述和乐制变迁之考订，对中西文化交汇下传统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未加深入探讨。

第七，对清代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研究目前仍附属于音乐美学的研究领域，以清儒的礼乐观和乾嘉时期经学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为主。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主要为：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音乐思想的历史变迁，则有张静蔚的《近代中国音乐思潮》（《音乐研究》1985年第4期）一文，对1919年之前中国近代音乐思潮予以概述；冯长春的《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描绘出那段曲折历史中一幅波澜壮阔的音乐思潮史诗画卷；明言的《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着眼于对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观念演变轨迹的多视角考察与研究，既是对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的梳理与勾勒，同时从音乐批评这一操作层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术思想对音乐批评观念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所述，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看，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仍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研究两大组成部分。音乐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其具有多学科交叉、重视大文化背景，以及强调基础文献研究的发展特色。音乐史学研究具有多样性目标，可以采用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中国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是音乐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其历史理

论与嬗变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剖析，不仅是音乐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应尽之责。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为中国传统音乐史学在清代的终结、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转型过程及其历史特征与演变动因。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以史证论”的原则，自始至终以音乐史家的文本文献、批评话语与学术思想为主线，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与研讨，以接受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从音乐史学、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音乐史著的分类及其构成情况予以系统探讨，并从中国音乐思想史和近代文化转型的立场上揭橥传统音乐史学的发展衍变历程，对西乐东渐而引起的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予以系统性考察与阶段性总结。

二、研究方法

1. 史料运用中博与精相结合

这一时期的音乐史学著述数量宏富，题材广泛，体例多样，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学术转型之特征。在大量音乐史学著述中，考订精详、有所发明者固不在少数，如毛奇龄的“乐不分古今”、江永的“俗乐可求雅乐”、程瑶田的乐器考古研究、凌廷堪的燕乐调研究、徐养原的“因俗变雅”论、陈澧对清代乐学的总结与批判等，然则疏漏、浅薄、讹误乃至陈陈相因、毫无新意的赘言复述者也相当之多。而且随着西乐东渐的加深和近代文化转型的加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中国本土新体音乐史著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之轨迹，这些都要予以充分考虑。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将在尽量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下，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点对其进行分析与批判，以保证立论的稳妥；而对大量重复雷同的材料，将予以必要的筛选，谨慎取舍，做到博观约取、取精用宏，使所用史料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当然，辑录、考辨史料只是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准确阐释、充分运用史料，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才是学术研究

的最终目的。笔者对史料的理解将采取历史诠释学的原则：①不厚诬古人，力争以现代的语言阐释原始材料，而不是以现代的学术价值观念、音乐审美标准强加于古人；②不曲解古人之意，将尽量联系论者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与自身追求去理解史料，所谓知人论世，这也是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 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史料的辑录、考辨、整理与阐释是从事文献学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但它还不能代替学术思想的研究。如果仅仅将各种史料堆叠与拼凑起来，还算不上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清代音乐史学嬗变及其转型研究的学术史论著。正确的方法是在充分占有史料、准确理解和阐释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探寻这些材料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根据这些逻辑关系重新组织材料，将研究对象放到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上进行深入考察，探索出一些符合历史实际的音乐发展规律，描绘出清代音乐史学递兴嬗变及其转型的演变脉络。笔者将尽量避免对一般内容的简单复述与平面介绍，而侧重于音乐规律的探寻、音乐史学现代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围绕“全盘西化”和“执中鉴西”两种思潮在音乐史学领域内的论争，揭橥其在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学术意义，以期达到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3. 跨学科、多学科交互与融汇

由于音乐史学学科的特殊性，研究者必须借助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钻研各类音乐文献资料，以逻辑学的判断、归纳、定义等科学方法，引入史学理论与近代文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相对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新史学的学科视阈中对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予以观照和研究。同时，由于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牵涉面较广，涉及学科领域和范围较多，在对音乐史学现代转型进行整体史研究的同时，必须进行个案研究，以明清之际到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乐学论著和音乐史家及其史学思想为研究个案，归纳、抽绎出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的演化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三、创新之处

本书以接受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从音乐史学、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音乐史著及其学术史价值予以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从学术思想史之立场揭橥音乐思想的发展衍变过程，对西乐东渐所引起的传统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予以总结与探研。中国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研究在当前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课题，学界可供参考的现有成果较少。限于学识与时间，本课题的研究自然也难以对这一时期的全部音乐文献及其所涉及的全部相关领域做逐一细致的考察，而只能撷取与音乐史

学相关的文献，力争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予以阶段性突破。

(1) 将音乐史学的研究纳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视域中，描述其从清中叶到清末民初的嬗变及其现代转型之轨迹。近年来，音乐专题史的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如中国音乐教育的现代转型研究、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观念的嬗变研究等。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即已提出要重视音乐史学作为专门史的地位与价值，而中国现代音乐史学奠基人王光祈早有详尽论述：

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只有挂账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述，此与近代西洋治历史学者大异。譬如吾辈治西洋音乐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须先研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术思潮、社会经济组织等等，然后始能看出该氏此项作品所以发生之原因也。至于吾国历代史书乐志，类多大谈律吕，空论乐章文辞，不载音乐调子、乐器图画……故此种《乐志》只能代表有清一代宫中庙中之乐，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来之中华民族音乐也。^①

王光祈从当时欧洲音乐史研究中得出启示，应注重将音乐史纳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全面考察，抽绎其发展规律，探寻其进化之迹，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辩证地看待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当然，由于历史时代和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王光祈未能对清代音乐史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研，更没有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进化与现代转型提出深刻的见解。今天，我们对中国音乐史学的现代转型进行深入探研，从专题史和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是一个富有建设意义的课题，它既是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丰富，也是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和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补充与细化。

(2) 本课题从学术史的角度理性回顾、勾勒自明清之际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主要历程，从而更为理性地审视这一时期音乐历史的发展特点。从音乐史学现代转型的角度对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加以全面关照，有助于我们提纲挈领、切中肯綮，更有条理、更为深入地认识与理解这一历史阶段音乐文化发展的逻辑规律及其学术意义。这一阶段中国音乐在欧风美雨中栉风沐雨，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抉择的迷惘，还有“路在何方”的论争，更有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和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如何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与评价这一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也是学界不断争鸣

^①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载《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

与反思的热点论题。对音乐史学的梳理、归纳与剖析，并以此为切入点，也可视为探寻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及其动因的必要且可行的内在理路。

(3) 以音乐史学为重点，关注音乐与学术思想演化、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不仅是本课题的研究要求使然，也是音乐史学研究中具有共通意义的学术思路。正如王光祈所言：“音乐为一民族、一时代思想之表现，倘若对于该民族该时代音乐以外各种思潮不能尽量了解，则对于该民族该时代之音乐亦不能尽量领悟。因之，研究音乐历史的人，必须同时注意其他各种历史。”^① 鉴往方能知来，史学研究最朴素也是最大的作用正在于此。理论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学术冲动，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努力做到学以致用，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精神引领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这一宏伟工程添砖加瓦。

^① 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绪言》，载《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